

願隨前薪作後薪

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系友回忆文集

王宗昱 主编

哲
1912

北大哲学系
百年系庆丛书

YUAN SUI QIAN XIN
ZUO HO XI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12

北大哲学系
百年系庆丛书

顾随前薪作后薪

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系友回忆文集

王宗昱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随前薪作后薪: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系友回忆文集/王宗昱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9
(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丛书)
ISBN 978-7-301-21244-8

I. ①愿…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9480 号

书 名: 愿随前薪作后薪——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系友回忆文集

著作责任者: 王宗昱 主编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244-8/K · 089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mm × 1300mm 16 开本 25.25 印张 378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忆王宪钧先生	王 浩/1
北大哲学系 1948 级	
——在平津战役炮声中坚守	李邦媛/3
记任继愈老师二三事	赵士孝/13
他的关爱他的追求	
——我念我师孙国华先生	沈德灿/16
幸依门下,羞负业师:送老师张岱年先生走好	欧阳中石/22
缅怀张岱年先生“刚毅木讷”的学术品格	
——从五十年前的“百家争鸣”谈起	谢 龙/24
赴大兴黄村公社教育革命忆记	宋文坚/30
怀念金岳霖先生	侯鸿勋/42
家庭影响我参加革命和选择专业	华海烽/48
上学记	朱德生/53
忆 1956 年前后中国哲学教研室的历史贡献	朱传荣/57
我在北大哲学系学到了些什么?	诸葛殷同/64
回忆燕园那个数理逻辑学术群体	何成武/69
早慧·中断·晚成的张岱年	
——张岱年与北京大学哲学系	钱耕森/74
忆沈有鼎先生	钱耕森/92
老树春来更著花	
——回忆我所认识的几位老师	林可济/96
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为往圣继绝学	
——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研究	林可济/113

不可遗忘的一场哲学争鸣

——回顾 1957 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张翼星/127
难忘的一段学习生涯	李存立/143
我的大学梦	李浙生/147
我的哲学启蒙老师汪子嵩	陈中立/153
回忆冯定先生	张文儒/160
我和北大	李焕诚/172
我是北大人	张永昌/176
难忘的 1956 年	涂荫森/178
党的人民哲学家冯定	石仲泉/182

难忘的教诲

——忆张岱年先生	李清崑/205
北大情结	陈瑞生/212
我们有幸聆听三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师的教导	王崇焕/217
《平凡的真理》对改造哲学体系的启示	许全兴/221
情深谊重的大学恩师	仓道来/233
永远的情怀	陈福今/247

涓滴钩沉,以颂系惠

——为庆祝哲学系百周年而作	李士坤/257
要求分配到新疆不被批准的感慨	吕造新/261
永遇乐	

——庆贺北大哲学系百年华诞(外六首)	宋定国/263
课堂之外	苑士军/268
百年系庆念师恩	吴建刚/271
如歌如梦的岁月	王俐君/274
学习生活漫忆	梁荫清/278
我心中那片璀璨的星空	司元岭/284
我与留学生拉格纳尔和别所养子同学的友谊	陶立群/290
北京大学哲学系有个来自农村的专修班	李志民/294

北大——我心灵的故乡	尹凤婷/301
校园生活点滴	王伟光/309
又想起了北大	王建武/314
回眸	许 辉/327
读书,是为了吃饭	黄贤华/331
随笔三篇	张凤林/335
忆小孟儿	王宝瑛/339
忆曾祖师芝生先生二三事	
——兼议冯友兰先生教育思想之精髓	雷 希/343
人生缘	郭 瑛/349
从燕园出发,我们开始自己的人生	高 沛/355
学逻辑以致用	毛 翊/359
爱智慧,爱生活	徐 涟/368
91 哲学之光影散记	缪劲翔/373
北大:横看成岭侧成峰	朱效民/377
那些年,我们一起上过的课	孙 丹/381
摇摇晃晃	许韩茹/385
追忆我们并未远去的青春	王海凤/391
关于哲学系的一点回忆	董 鹏/394
编后记	397

忆王宪钧先生*

王 浩

在修改这篇序言的过程中,得悉北京大学王宪钧教授于1993年11月19日逝世的噩耗。他是我一生最亲切的老师,也是译者的老师,我们都深感悲痛。

宪钧师1937年春赴维也纳大学深造,主修数理逻辑,并且成为哥德尔的“集合论公理体系”这门课程唯一正式注册的学生。他是能提供哥德尔当年授课情况的极少数见证人之一。他曾来信告诉我,哥德尔认为有了不完全定理以后一般数理逻辑问题已经无关大局,当他问及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时候,哥德尔断然答道:“现在么,集合论。”他还记得哥德尔向他推荐过几种布朗的学位论文《证明论研究》,也有弗兰克的《集合论初阶》及豪斯道夫的《集合论》。宪钧师在维也纳的时间不很长,但是哥德尔严格的作风和深邃的眼光显然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宪钧师早年的一项大功绩是把业已成熟的数理逻辑引进了中国的大学课堂,这种逻辑大大超越了怀特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正转入希尔伯特学派、司寇伦、哥德尔造就的新轨道。不只是我这么看,据译者回忆,沈有鼎教授也作过类似的评断。

1939年秋我考入西南联大,适逢宪钧师回国不久,就要开讲符号逻辑课了。我入学前读过金岳霖的《逻辑》,了解一点罗素的逻辑而又很不满足。按规定,宪钧师这门课只有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有权注册选修。可是,他待我格外好,不但允许我旁听,还常常在课外指导我自学更多的读物。他提醒我学逻辑需要看德文著作,1940年暑假将他自己仅有的一本《理论逻辑

* 节选自《哥德尔》中译本序(康宏逵译)。

辑基础》借给我,用它来边学德文边学逻辑。我二年级再度旁听他的逻辑课,三年级又跟同班的吴光磊一起注册选修。宪钧师讲课不图广博深奥,务求把基本知识和技巧讲得非常透彻。我觉得,正因为那些年基础打得扎扎实实,日后我在哈佛大学才能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博士论文。

在昆明读研究生的几年中,时不时总要与王宪钧、沈有鼎老师交流逻辑学哲学的心得,感情十分融洽。宪钧师态度严谨,判断成熟,对我这个新手认清课题难易、任务轻重很有帮助。1946年春我考取公费留学,路过成都,又同前去休假的宪钧师会聚了好几次。不想成都一别,天各一方。虽然断续通信近20年,直到1972年夏天才有了相见的机会。其后每次回国,我们都要欢聚畅谈。1985年北京大學聘请我作名誉教授,他也欣然到场讲话。去年5月我再访北大,差不多天天去他家探望。毕竟他已是83岁的老人,身体相当虚弱,但他的精神依然颇好,思想敏锐、言谈风趣一如往常。返回纽约之后,我还跟他通过几次电话,并未发现异常。可怕的癌症复发这样快便夺走了他的生命,实在是我一点也没有料到的。

我与宪钧师交往超过半个世纪。和他相处总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说不出的亲切,说不出的温暖。他为人正直,识大体,戒浮夸,平等对待一切人,和气而不放弃原则,凡事必定仔细权衡轻重。他这些长处让人羡慕,但并非轻易可以学到的。

宪钧师做学问至为诚实谦虚,真正做到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思想和语言极其清晰,可以说绝无仅有;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有一种清新和纯洁之感。他讲课和讨论的明白彻底也是常人难企及的;听听他发表意见,就会明白怎样才叫“理解”了一个科学道理。

我的启蒙老师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都先后离开了人世。他们是现代中国建树哲学、传播逻辑的先驱。我衷心盼望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北大哲学系 1948 级

——在平津战役炮声中坚守

李邦媛

1948 年,西南联大迁回平津的第三年,北大、清华在全国设五个考区联合招生。当年北平已笼罩在战火迷雾中,皇城落寞,风沙凛冽;其地理位置足以使南方青年却步。但北大仍吸引来四万多考生,最终录取了 440 人,录取率 1%。

国立北京大学秘书处(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即 1948 年)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周刊》,公布了 1948 级录取新生名单,北平、上海、武汉、南京、沈阳五个考区共录取文科 125 名、法科 104 名、理工农医 187 名。哲学系有:北平区杨去塞、姚光曙、龙翔、牛荫生;南京区卢××、李成栋;上海区钱听涛、许宴如、倪祖梅、丁利吾、何××、李邦媛;武汉区杨宗鑫、徐××、张××。名单在《中央日报》上刊出,录取通知书随后寄达。这批榜上有名者 11 人按时报到注册,隐名的 4 人弃录。加上 1947 年已考取而推迟一年来校的张尚书,读了一年北大经济系后转系的郝德乾,有特殊任务而“留级”的程周封,1948 级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共 14 名。最大者时年 25 岁(程周封、丁利吾),最小者倪祖梅 17 岁,我 18 岁。约 4 人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其余已有多年的就职或就学经历。如龙翔一年内已读过金陵女大、朝阳大学,又考入北大;李成栋已在贵阳大学读了一年;姚光曙 1947 年已考入云南大学,追赶西南联大来到了北平;钱听涛已在燕京大学注册然后跳槽。

我们汇集北大的初衷是:北大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时代的摇篮,拥有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光荣传统。当初蔡元培校长为它制定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胡适校长也遵循了这个方针。北大名师荟萃。我们要通过勤奋学习,

独立研究,接下科学民主的大旗,继承母校悠长深厚的传统,成为爱国学者。

当年北大校舍散处城中心区,我们到沙滩民主广场参加全校迎新会时,听秘书长郑天挺先生介绍:“北大名气虽大,但校舍破旧分散,有的宿舍就是一个四合院。说是40处,集中起来还就是一、二、三、四,四个院及医农工三个学院。”一院是沙滩红楼,为校本部及文法学院教学楼;二院为理学院,是京师大学堂原址;北河沿的三院在1948年时是男生宿舍;而四院则是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新生的校园。

北大四院坐落在原宣武门内国会街26号,老城墙根下,是一座独立幽深的花园楼群,就是民国时期的国会大院,小街由此得名国会街。

这里原是明、清两朝的养象房,末代清帝宣统二年(1910)将这里作为资政院,被称“中国第一代大会堂建筑”,礼堂建筑面积约2100平方米。它历经了国会议场,北洋政府众议院院址,曹锟贿选现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日寇占据等功能转换,到1946年,它的铁门柱上挂出了“国立北京大学第四院”的竖牌,随后接纳了北大文法学院先修班、1947级、1948级的一年级新生。

这国会大院坐北朝南,正门南墙由又高又粗的铁栅栏间以粗石柱围成,拱形双开大铁栅门高耸正中,前庭小树林和其后隐立的工字楼就当街暴露着,那是我们的教学楼兼四院主任办公室;楼西小操场后的国会礼堂自然成了我们的大礼堂;工字楼东边一条斜敞廊通往北边的食堂浴室小卖部;更东面是一栋方形两层灰砖楼——女生宿舍口字楼。

口字楼一层各室既是小女生们的温馨小窝,也兼做书房、游艺室、社团活动室。由于有暖气,冬天没有大火炉占地,还可举行节日 party。

男生宿舍在工字楼后面的小花圃迤北,是平行的两栋二层老木楼,正面看类似两侧带敞廊的加长双层车厢,又好像火柴盒。每层分别以仁、义、礼、智斋命名。无暖气,冬天可在大火炉上烤白薯炖萝卜。

我们躲进大院成一统,十分快乐,万事俱备,只待名师授课。

我们首先想见的是胡适校长。都说我们哲学系新生经层层筛选后的考卷是他亲自审阅并最后圈定录取的。他就任北大校长后推行一项改革,规定文科各系新生都必须修习科学概论、哲学概论和中国通史。每次课题要

邀请著名学者来校讲授。这跟我们的选修科目直接有关。

1948 年 9 月我们在全校迎新会上,初次目睹了他的风采。他戴眼镜,西服革履,脸带笑容,是一副亲民形象。就是他那张标准照的模样。

胡适在我们青年中早就名闻遐迩了。首先是因为他的名字是读了严复的《天演论》(赫胥黎著),深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感悟而改名胡适,字适之。其次他从 1910 年至 1917 年留学美国 7 年,深刻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科学思想。1917 年 7 月回国作为新派学者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大教授,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史上留下了重大影响。

他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更是广为人知。这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使各种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容易传播于民间,白话文学作品也开始产生。胡适是其恩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方法论的信徒,他首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他还第一次将中国传统小说作为学术研究课题,开创了一代新红学。

胡适常提出许多著名口号,几乎每个口号都引起一场大辩论,从而在不少领域起了开拓作用。他那三个口号:文学应是“活的文学”、“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基本上代表了“五四”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潮。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都引发了论争。但胡适卸任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以及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之职,到北京大学当校长后,却放任学生大谈主义。最近有资料认为,首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便是胡适。

胡适校长主持校务,很少讲课,但他到四院礼堂讲过两汉哲学思想,把中西哲学作对比,盛况空前,礼堂过道都站满了听课的学生。

我们 1948 级同学跟胡适校长有过面对面的谈判。10 月底,四院同学列队赴沙滩向胡适校长请愿,要求全面发给公费。这被称为“争温饱”运动。

法律系小女生邓可因的日记写了这件事:“早上九点,我们的大队就自四院出发了。……(到沙滩后)先在民主广场绕了两周,喊了些口号,有些

沙滩的同学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后大家一同到校长室门前去见校长。胡校长答应我们可以个别向学校借钱,同学们仍坚持要学校垫发给每位自费同学一部分钱,让大家可以交下月的饭钱,像这样僵持着,直到午饭时仍未解决。……到了下午五点,大家才决定暂时回校,那时学校已答应我们借款的数目以膳团副食费的数目作参考。四院的主任赵乃抃先生答应给我们做保人,向学校借款。”

我胆子小,跟在大家后边当个尾巴,不像有的同学拼命往前挤。我们喊的口号是“学生吃不饱,校长有责任”。我只记得校长站在他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跟学生代表谈话,只穿着半新的棉袍。这次脸上没有笑容,但我觉得他是同情学生的,答应想想办法。

潘乃穆的妹妹近年访问台湾,为我们复印了台北市远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于1990年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上一则亲笔记录:“第四院一年级学生无公费的居多。他们生活甚困苦,今排队到嵩公府请愿。”

迎新会后我们按各自选修的课程上课。北大档案馆仍保存着我们注册表上填的选修科目。我和系友都选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胡世华先生的“数理逻辑”。我还选了邓广铭先生的“中国通史”、沈从文先生的“现代文学”等。

我们上课的工字楼,东西两端是大教室,其他小教室并不固定给哪个系,订出课程表供各系学生的选修课使用。教室里没有书桌,只有宽大的歪把靠背木椅。就是椅子右扶手伸出一个跟书本那么大的板子让你记笔记,我们叫它歪把椅。我记得我到沙滩校本部去领过文具纸张,当时就在那种白纸上写笔记,连眉边都不留空,很节省。

我早就发现,中学的同班几乎都是同龄的小毛孩,而大学则不然,我班24岁的许宴如兄,在知识根底、学习方法、观察理解等方面都胜过我们小字辈。他关照我们,贺麟老师是精研黑格尔哲学的大师,又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问、道德素为人景仰。贺老师和胡世华教授,都是德国老留学生。听他讲课时要集中注意力,不懂可以提问。

而我们这些小女生,听正课有时心不在焉,而课堂花絮反而常常储存在脑中。如胡世华先生讲概念种类时,在黑板上写了“胡适与牛”四个字,讲

解“胡适”与“牛”是两个并列的概念,既非从属,也不部分重合,所以“胡适”不是“牛”,“牛”非“胡适”,这令我们非常惊讶。他另一次举的例子:天上下雨,地上积水;地上的水并不就是天上的雨。对这种直白我们也开怀大笑,至今似言犹在耳。

老师们现身说法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修养和精博的学识,及持之以恒的钻研探索,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那时北大的学习环境宽容自由,学习资源丰富。我们除四院的课程外,还可到红楼、北楼去听许德珩先生的“社会学”等大课。当然,还有时间泡图书馆。我班 19 岁的江苏常州少年钱听涛酷爱读书,天性善于刨根问底,尤爱探索历史掌故,破解历史谜案,他几乎跑遍北大各藏书地。四院图书馆藏书已很丰富,也能读到马恩著作的译本,如《资本论》、《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等。嵩公府北大校本部的老图书馆,更是当时第一流的,藏书 30 万册,是知识的富矿。图书馆是学生主要的自习场所。晚上馆内灯火通明,学生大多坐到熄灯闭馆。

那些年学生敬仰学贯中西的师长,也有自发组织学习团体的传统,如沙滩的“芒种读书会”、“子民图书室”等。“子民图书室”就在红楼 167 号,那是一间约 40 平方米的教室。有时学生怀揣两个窝头,到那里找书读,有几千册书呢。

四院学生包括钱听涛常是那里的读者,但若要借出去读,须办理借书证。几十年后他发现了那张“子民图书室借书证”,用的是学号,每证在一学期内有效,还要有保证人。纸张已发黄,他贡献给北大校史馆了。

我在开课前闲逛时就撞见了四院文化服务社的藏书,我一口气借读了四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士敏土》、《罗亭》、《父与子》。地下党员李容从中“看出”我是孺子可教,邀我迁进她的宿舍口子楼 24 号,这里后来成了地下活动的据点。她在此组织了学生社团“星火社”,并发展我秘密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联”。还把我和哲学系的杨去塞、杨宗鑫编为一个民联小组,定期学习她提供的书籍。

我班三名 19 岁的小师姐都比我早进步。她们早已处在北平进步圈中,有了更明晰的政治倾向,更成熟、干练。来自昆明的姚光曙早就在沙滩参加

了北大的学生运动,她头脑清醒,胆识超群,机敏沉稳,气质清丽,推动了前哨社的建立,并且参加了中共另一地下外围组织“民青”。而文静端庄、一双大眼睛透着真诚和自信的北方姑娘牛荫生,也很快加入了“民青”。

我班的湘妹子龙翔格外活跃,她性格开朗,快人快语,直白道:“我们当初成立剧艺社的目的,就是想发展一批盟员(‘民青’成员)。”她们的寝室在陈慰慈组织下成为剧艺社的据点。从沙滩拿来的进步书刊、宣传品就藏在暖气管后面。

各社团学习内容大同小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封皮有伪装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等文章。大家都想寻找新真理,换个新天地。

10月份发生了一件调动全四院13个系学生积极参与的事件,是自主选举北大学生自治会四院分会的代表和理事。场面热闹非凡。10月23、24日各系推出候选人,我系是许宴如、龙翔。工字楼教室走廊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竞选纲领和口号,油印报宣传,支持者调动三寸不烂之舌辩论,候选人真诚许诺服务,许宴如说:“我是哲学系选出的系代表,我自认是一个笃实认真、敏于思考,也能做一点实事的人。被选上站到了风险第一线。但北大的民主传统应坚持,我会愉快地担起工作。”“选民”们认真衡量各位候选人的才干、优点。25、26日,约200人参加投票,晚上在第九教室当众开票,选举结果有13人当选理事,许宴如、龙翔顺利当选。

这届理事会做了很多繁杂的服务工作。管过膳团。经济系理事开办福利银行,为同学们手中的生活费保值。学艺部请许德珩、樊弘、王铁崖等教授来四院讲当前形势。体育健将龙翔管康乐部,组织各系之间的排球赛之类。冬天从沙滩领回黑棉大衣供给贫寒学生。

我们是解放前国立北京大学的最后一届学生,亲身经历了新旧社会交替时刻那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9月、10月战火还远在东北,12月平津战役揭开序幕。学校停课,龙翔等撤往解放区。在那个“和”、“战”尚不明朗的寒冬,我们共同在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在国民党20万守军向城内收缩的乱局中,边读书、边巡逻护校。学生自治会配合校方组织四院应变委员会,抵制住国民党政府将北大迁往南方的图谋。我们储粮蓄煤,保证围

城期间同学们的口粮。许宴如还组织同学在四院后面空地挖防空掩体。牛荫生等还到老师家中留别南撤。

但大家毕竟都太年轻,不明白时势有多危急,照常唱歌跳舞读书,还兴高采烈地准备五十周年校庆、举行新年聚会。

北平围城达两个月,而且曾有一枚攻城炮弹落到了北大三院门外的垃圾堆上,我们正如常说的那句象征语:在黎明前的黑夜中守望。事实上,北大四院男生们还真有一段摸黑过日子的体会,因为 1949 年元旦前后,宿舍忽然停电,连蜡烛都难得点上,到 1949 年 1 月 23 日,校园内忽然电灯大亮,广播通告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校园内欢声四起:天亮啦!

傅作义将军的 20 万军队撤出北平城接受改编,我们开始迎接解放。

1949 年 2 月 3 日,解放大军入城,盛大的入城式。我们从国会街走到前门外大街汇入欢迎的群众队伍,不停地挥小旗、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坦克车开得很慢很慢,男生想挤上装甲车,写几个粉笔字表示欢迎。

当年北平城内缺少大礼堂,于是我们四院那栋世外桃源般的国会礼堂,竟大有用武之地了,成为众多历史事件的吉祥地。解放军入城式翌日,即 2 月 4 日,北平市委在我们礼堂召开全市地下党员大会,共开了三天,是全北平的地下党员大会师。

北大四院地下党支部江仲怡、李容及我系程周封都参加了。北平是华(北)野与四野共同解放的,当时有聂荣臻、薄一波、林彪等到会。

1949 年 2 月四野战车兵团借我礼堂召开庆功大会,邀四院学生同庆,形成热烈的军民联欢。几天后,该部队派来很多卡车,把我们四院在校学生差不多都拉到他们驻地丰台去联欢,招待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猪肉和米饭。不久,四院就有一些同学参加了他们的部队。

那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受革命时代的召唤,又被亲眼目睹的解放军老战士的英雄事迹与朴素语言深深地打动,纷纷投笔从戎。牛荫生说,联系到我们哲学上讲的认识论,我意识到革命实践太重要了,哲学的任务之一不正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么?!我首批报名参军,组织输送我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不久调入四野新华社总分社作见习记者。4 月 22 日,随军南下。

不久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招生,钱听涛和许宴如等由四院地下盟员介绍一同加入了南工团,3月14日,一辆三轮车就把他们的行李带到东直门海运仓的朝阳大学报到。

1949年2—3月,北平市军管会通过中共北大四院党支部抽调走大批学生参与接管旧政权。我班有张尚书、程周封、李成栋、丁利吾、杨宗鑫、杨去赛与我,被分配在北京基层政权机关。其时我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说:我还小,派不上什么用场的,我再念一阵书吧。这次李容严肃教训称必须服从组织纪律。我明白接管旧政权的革命工作比任何个人兴趣都重要。2月26日,我轻装爬上几次都踩不上去车帮的卡车,到了北平市外二区军管会。那时行李还留在四院,床位还给我们留着。好几个月我们还经常回四院住宿,处理个人事务。

仍留在学校的有:姚光曙,后转至西语系;倪祖梅,后转医学院;丁利吾工作后又回校读数学系;郝德乾坚守在哲学系。

就这样,我们1948级哲学系学生中,有2/3以上成了母校的早产儿,像羽毛未丰的小燕子,在大动荡的时代潮流中,裸飞进入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开始了小螺丝钉的人生。虽然我们后来根据革命需要继续接受了其他的高等教育(钱听涛后来读军委外文训练班,并赴我国驻开罗大使馆学阿拉伯语三年;龙翔读北京钢院热处理专业;牛荫生读哈尔滨一大学机械系;我读毕了三年半北京俄专——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杨去塞多年后又返读北大哲学系)。但终究平复不了未能完成北大学业的终身遗憾。

我们本都是一心读书并且极端喜爱北大这块求学圣地的青年,但大都服从分配投入革命洪流,确实是对革命最虔诚的奉献了。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根据政策认可我们这批奉调离校的在册学生为1952届毕业生,并可补领一张红绸毕业证书,这是学校对我们的抚慰和鞭策,勉励我们别辜负母校期望。

北大四院那些时日是我们最怀念的,毕竟我们的社会人生是从这里起步的。我们在这里得到培育,吸收知识,受到熏陶,增长才干,塑造自己的独立人格。

我们几乎是感性地领会和吸纳着北大的爱国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努

力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传统。我们全身心投在北大自由民主的大熔炉中；我们在四院接受政治启蒙，并且迈出了踏进革命队伍的第一步，这是我们一生的转折点，北大对我们基本品质的形成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我们班至少有一半同学是真心喜欢哲学的，如许宴如、杨去塞、牛荫生、郝德乾、钱听涛、张尚书；我和丁利吾喜欢数学，我误认为学数学将来没用处，但我想我会钻研美学、逻辑学的。我们的离去是否就与哲学无缘了？

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的嫡孙杨去塞曾二进哲学系。他一心学以致用，献身真理。他在做农村调查时，据实写了质疑性的《关于包工包产政策》，即被北大除名，回山西闻喜老家务农。平反后又误入干部劳改林场，后作为北京计算机中心翻译人员离休，一生难圆哲学梦。90年代他被选为北京市第八届政协委员，得以一酬忧国忧民的壮志。

郝德乾读毕北大，又上人大哲学研究生班，不料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扣上“小集团”罪名批判，下放“三线”，去支援兰州铁道学院。“文革”中继续遭浩劫。厄运终结后倾心执教，入党、评教授，不枉此生了。但他的哲学情结被无情的现实阻遏了。

我们的带头大哥许宴如一进校就显现学者风度，他权衡了时代要求，毅然参军。但也在反胡风运动中遭遇无妄之灾。转业上海轻工教育界，教过政治理论课，他的组织领导才能被开发，登上了这所轻工局高等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职位，并离休，成就了一番事业。

江苏常州钱家属名门望族，钱府私家花园“未园”至今是文物保护单位。钱听涛在破落儒商家庭中度过童年，他是个矢志不渝的读书人，秉性单纯、直率执著。1949年3月参军南下，迅速入团入党并学了阿拉伯语，长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从事翻译及中东问题研究。他干什么都全力以赴，成果斐然，晋升大尉。1982年他谋求回归少时抱负，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身中央党校资料征集委员会），任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参加三个中央单位联合编纂《中共组织史资料（1921—1987年）》丛书，并担任中央卷副主编。这是个浩繁的大工程，他呕心沥血达十余年，集体成果计19大册，1500余万字。离休时被评为副编审，常州市聘他为张太雷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出版了与人合写的《张太雷年谱》，发表各